

歲月書香

二集

百年中華的書人書事



1469132

百年中华的书人书事

岁月书香

二集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书香:百年中华的书人书事. 第2集/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2.3
ISBN 978-7-101-08535-8

I. 岁… II. 中… III. 中华书局-史料
IV. G23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7029 号

书 名 岁月书香——百年中华的书人书事(二集)

编 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

封面题签 刘 涛

责任编辑 张玉亮 孟庆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⁵/₈ 插页 4 字数 18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535-8

定 价 28.00 元

百年岁月 一脉书香

岁月波澜，书香绵延。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了她的百年华诞，这是中华同人与广大作者、读者共同的节日。一百年历程，数万种图书，构筑起中华学术文化的共同家园，而根植其间的，正是那些世代相传的书人与书事、精神和情怀。为此，我们特别编选了这部系列文集，跟大家一起回望时光的斑斓，追怀先辈的风雅。

这部系列文集分为四集，所选文章大体以人物和事件的时代为序，以开创基业、建国之初、“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四个历史阶段划分。选文的标准，侧重内容的可读性，增广见闻，以备故实，涉及书局变迁、转型等重大事件，以及那些跟书局休戚与共的作者、编辑，那些图书、刊物背后的故事。限于篇幅，总体而言，选文详远略近；部分文章采用了节选的方式，在不影响文义的前提下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还有一些偏重学术、兼具书评性的文章，此次未能收录，将另外编选刊

行。所选文章因为写作或发表于不同年代，叙事或欠完整，语境容有差异，我们尽可能保留了原文写作时间，附注文章出处，供读者参考。

历史的印迹，在我们的脚下延伸。这部小书，只是百年中华一路前行的一个侧影，愿这百年岁月，一脉书香，常驻心间。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2年2月

目 录

齐燕铭与中华书局	李 侃	1
吴晗与中华书局	李 侃	24
郭沫若和中华书局二三事	俞筱尧	37
叶圣陶和《永乐大典》	俞筱尧	47
《资治通鉴》标点工作回顾	蔡美彪	55
一个未能实现的出版计划		
——1960年代中华书局与陈寅恪先生的交往		
.....	徐 俊	68
往事可待成追忆		
——记顾颉刚先生与中华书局的交往 ...	李 岩	94
顾颉刚与中华书局之交往		
——写于《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	俞国林	101
《尚书校释译论》引出的尘封旧事	徐 俊	117
从《励耘书屋丛刻》说到中华书局		
——陈垣生前著作的出版情况	刘乃和	138

郑天挺与中华书局	郑克晟 161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建立与中华书局	阴法鲁 177
《文史》诞生的艰难历程	沈玉成 188
《文史》掇忆	傅璇琮 200
金灿然和中华书局	俞筱尧 210
怀念章锡琛先生	吴翊如 239
片断回忆业师陈乃乾	
——每劳三旬九食之忧,何以保此绝无仅有之书?	
.....	胡道静 244
追忆陈乃乾、陆高谊等在中华影印工作的事迹	洪文涛 256
作者的知音	
——记徐调孚同志	周振甫 268
追忆调老	程毅中 傅璇琮 沈玉成 288
忆曾次亮师	赵 琪 296
不该忘却的长者:宋云彬先生	谢 方 302
怀念古籍整理专业户汪绍楹先生	程毅中 313
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	沈玉成 319

齐燕铭与中华书局

李 侃

时光流逝，转眼间中华书局又要迎接成立七十五周年了。近三十年中，我在中华书局经历的种种往事，有些早已印象模糊，有些渐渐淡忘。可是有两个人和他们在中华书局所留下的业绩，是我终生不能忘记也不该忘记的，这就是金灿然和齐燕铭同志。关于金灿然，我已经写过两篇怀念性的文字。现在仅就记忆所及，并查阅了一些档案材料，谈谈齐燕铭和中华书局的关系。一则表示怀念之情，二则也想借此留存一些历史资料。

关于齐燕铭的出身经历，我所知极少，这里只好照抄“悼词”：“齐燕铭同志是北京市人，蒙古族，从1925年起，在党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鲁西北《抗战日报》主编及政治干部学校教务长，冀南主任公署太行办事处主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等职。抗战胜利后，随中共代表团去重庆、南京，担任代表团秘书长，以后又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秘书长、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秘书长。解放后，历任中国共产党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候补代表，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等职。”齐燕铭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文化战线上卓有成就的领导干部，同时，还是一位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学者和专家，他在文学、戏剧、文物、书法、金石和古籍整理等各方面，都有深湛的造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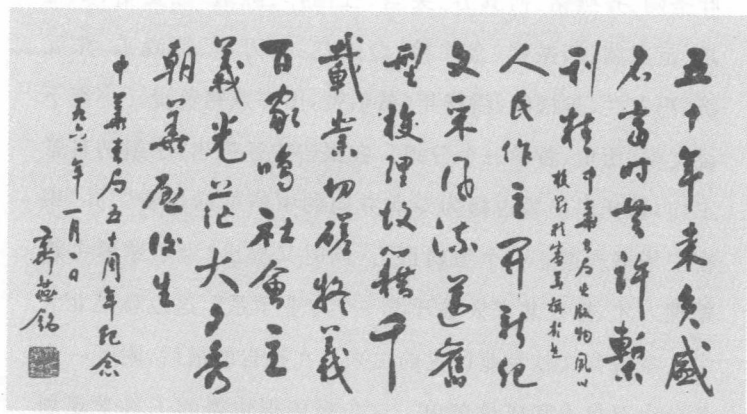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成为以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学术著作作为主要任务的专业出版机构，是与齐燕铭密不可分的。为了说明齐燕铭与中华书局的关系，必须从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始末说起。

1957年12月10日，齐燕铭向当时以聂荣臻同志为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建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小组的主要任务是：

(1)确定整理出版古籍的方针;(2)领导制订整理出版古籍的长远计划和年度计划并且检查这些计划的执行情况;(3)拟定培养整理古籍人才的方案。小组由十九人组成,他们是:叶圣陶、齐燕铭、何其芳、吴晗、杜国庠、陈垣、陈寅恪、罗常培、范文澜、郑振铎、金兆梓、金灿然、赵万里、徐森玉、张元济、冯友兰、黄松龄、潘梓年、翦伯赞,由齐燕铭负责。小组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在报告中还提出“小组的日常工作,依托以出版古籍为专业方向的中华书局负责”,并“拟在中华书局设立一个编辑部”。同时又提出“为了培养古籍整理人才,拟在北京大学开设一个专业学系”,这也就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设置的由来。在报告的最后,附了一个各分组召集人和成员名单。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批准。现将各分组成员名单列下:

(一)文学组:召集人郑振铎、何其芳。成员有:王任叔、王伯祥、王瑶、余冠英、邢赞亭、吴晓铃、林庚、阿英、孙楷第、徐嘉瑞、徐调孚、章行严、陈翔鹤、冯至、冯沅君、游国恩、杨晦、叶圣陶、隋树森、赵万里、钱钟书、魏建功、罗常培、谭丕模。

(二)历史组:召集人翦伯赞。成员有:于省吾、尹达、白寿彝、吴晗、吴泽、汪篾、周予同、周云青、周谷城、邵循正、金



齐燕铭为中华书局成立 50 周年题词

兆梓、金毓黻、范文澜、徐中舒、徐炳昶、徐森玉、翁独健、夏鼐、宿白、张政烺、陈垣、曾次亮、贺昌群、傅乐焕、齐思和、邓广铭、邓拓、顾颉刚、阎文儒、聂崇岐。

（三）哲学组：召集人潘梓年、冯友兰。成员有：王维庭、石峻、朱谦之、李达、李俨、吴则虞、吴泽炎、杜国庠、汪奠基、林宰平、林涧青、侯外庐、胡曲园、孙人和、唐钺、容肇祖、陈乃乾、稽文甫、杨荣国、赵纪彬、刘盼遂、谢无量。

从上面这个小组名单和各分组名单可以看出，规划小组包括了当时文史哲各方面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如今时隔近三十年，其中很多人已先后逝世，也有不少人是在“文革”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而死。而健在的专家学者也多是七、八十岁的学界前辈了。

在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了齐燕铭的报告和小组名单之后，他又在1958年1月21日给中央宣传部和周扬同志写了一个报告，比较全面地说明了中国古籍的情况和整理出版工作的现状。提出“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是远远落在客观需要的后面了”。提出需要“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合理地组织人力，提高整理和出版质量，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使这一工作适应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建设事业日益发展的需要。报告还根据不同类别的古籍和不同的读者对象，对整理方法和

步骤提出了具体方案,并建议中宣部对此进行一次讨论。

同年2月9日到11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议。齐燕铭在会上就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情况和今后的方针、计划要点作了报告。康生、周扬也在会上讲了话。(当时的康生对整理出版古籍表现了热心赞成、大力支持的姿态。而且以“内行”的架势发表意见。然而“文革”期间,他却翻云覆雨,对古籍整理工作极尽诬陷迫害之能事。)同年4月,文化部重新安排了中华书局的任务,规定中华书局“除以出版古籍为主要任务外,还适当出版现代作者的文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并在上海设立一个编辑所”。这时,金灿然同志已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中华书局同时也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金灿然兼任办公室主任。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是新中国文化事业史上的一个重大措施,齐燕铭同志在这个事业中作出了重要的建树,而对中华书局业务的开展和历史命运,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

我于1958年7月调到中华书局工作,当时对于古籍整

理不但知识极少，简直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对金灿然同志过去虽然认识，但并不熟悉。对齐燕铭同志虽然久闻其名，也只是在他担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期间，因我那时在中央宣传部的知识分子工作办公室工作，参加过两次他主持召集的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座谈会。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感到他是一位文雅庄重、气宇轩昂的人物，私下里曾与同去的同志议论：齐燕铭确有与周总理颇为相似的风范。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以后，工作进展很快，在1958年4月到6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都各自制订了一个计划草案，开列的书目洋洋大观，包括“经、史、子、集”各种古籍不下万余种。当时正是“大跃进”的“高潮”，现在回想起来，“大跃进”固然是“左”的指导思想下的产物，对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后果，但当时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干劲确实很高。齐燕铭在百忙之中，不时也到中华书局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从此与他接触逐渐多起来。当时他和金灿然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在各分组制订的规划草案基础上，制订一个综合性的长远规划。据我的记忆，除了各种专项计划之外，一共搞了三次长远规划。其中有一次只是提出一个草稿，几经讨论，并未形成正式规划，以后（大约是在

1959 年左右),就以这个草稿为基础,搞了一个《整理和出版古籍的十年(1962—1972)规划》,这个“规划”的开头就说,自从 1958 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之后,“制订两次长远规划(草案),这样就使整理和出版古籍的工作有了计划性。但是,由于这项工作开始不久,经验不足,加之在这一时期内,有关学术机构的教学和研究任务繁重,古籍整理出版机构的人力不够充实,因此,规划草案中所开重点项目,绝大部分未能实现”。十年规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下制订的。然而古籍整理工作得不到顺利开展,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从 1958 年的“大跃进”到 1959 年的“反右倾”,运动不断、“批判”不停,在此期间(1958 年春)陈伯达又在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号,这对整理出版古籍部门和经营古书行业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冲击。中华书局有些编辑人员感到自己的工作是属于被“薄”之列,因而思想波动;中国书店有些发行工作人员,因为营业萧条,门庭冷落(买古书的人减少,卖古书的人增加)而惴惴不安。这些情况,都反映到齐燕铭那里,并且希望他能对古籍出版、发行单位的干部、职工讲讲话。他先后就古籍发行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应如何对待“厚今薄古”讲了两次话,一次是 1958 年 7 月 12 日,在中国书店举办的古籍

发行人员训练班；一次是在中华书局。齐燕铭在当时当然不可能直接批评“厚今薄古”这个口号，不过还是婉转地表示了他的看法。

他首先回答了古书和整理古籍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古书发行和古籍整理工作有没有前途的问题。指出“厚今薄古”“并不等于把古代的东西抛弃不要。因为中国有四千年的历史，如《诗经》中就有三千年前的作品……如果认为古书的存在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就应消灭它，这就不是厚与薄的问题，而是存与废的问题了”。他认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古代历史文献和古典文学作品与社会主义建设不应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吸收古代文化，会使社会主义文化更丰富多彩起来。进而指出“不但中国的古籍要研究，外国的古籍如柏拉图、莎士比亚、达尔文、托尔斯泰的名著，我们都要研究”，都要拿过来利用。对于古书业传统的技术要保存，要有人学习，把它继承流传下去。他着重说明，古籍整理和古籍发行工作，肯定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肯定有前途，要大家不要消极，不要灰心，关键在于认真钻研业务，为人民服务。两次讲话的内容基本相同，只是针对两个单位的不同特点，内容也各有侧重。他在讲话时，不是以领导者的口吻教训人，而是用平常谈话的方式，把问题讲得入情入理，

平易近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制订规划的问题。十年规划(草案)虽然已经把古籍项目压缩很多,但仍然不可能实现。于是在1960年,齐燕铭又提出要根据当时党对各项文教事业“全面安排,保证重点,提高质量,突破尖端”的方针,制订一个《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的重点规划》。

从1958年开始,除了第一次文、史、哲各分组制订的规划我未曾参与之外,其余几次规划的讨论、起草、修改工作,我都有幸参与其事,对齐燕铭同志的接触、认识也多是通過制订规划逐步加多的。在前两次制订规划过程中,齐燕铭虽然也亲自过问,但一般主要是从方针政策和基本做法上给予指导,其间也召集过几次座谈和讨论,这些座谈和讨论多是利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开会的机会,邀集部分小组成员和有关学术界人士征求意见。而这次制订“重点规划”,他就不但在方针政策和方法上做具体指导,而且对每一类古籍的整理,从读者对象、整理方式,乃至许多具体项目,他都要亲自过问、反复斟酌、决定取舍、加以增删。在这个“重点规划”的“纲要”中,把古籍的读者对象分为“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大类。前者包括“古籍读本”、“古籍普及读物”、“古籍今译本和改写本”以及《中